

财政资金支持与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

范燕丽 丛树海

[摘要] 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民持续增收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经济基础。本文基于2006—2019年县级面板数据,以脱贫县农民为研究对象,使用合成控制法评估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情况及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与合成县相比,约35.48%的县的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上升,约45.16%的县下降,约19.36%的县基本无差异。财政收入端和支出端的共同挤压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大,进一步对地方政府整体财政支出产生约束,进而对不同自我发展能力的地区产生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结构优化与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提供了原动力。

[关键词] 乡村振兴;低收入群体增收;地区异质性;财政资金;合成控制法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低收入群体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保障人群”“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习近平,2021)。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依旧是低收入群体的集聚地(杨穗,2022),如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脱贫县、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促进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更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因此必须把保障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作为现阶段的重要任务。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历史性成就表明财政资金在保障低收入群体增收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完全依靠财政资金自上而下的推力,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①2021年和2022年中央分别安排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561亿元与1650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培育和壮大欠发达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②脱贫攻坚

* 范燕丽(通讯作者),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地方财政研究院,邮政编码:310018,电子信箱:fanyanli@zufe.edu.cn;丛树海,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本文得到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财经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课题“发展韧性视角下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研究”(ILFR202303)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感谢浙江财经大学钟晓敏教授、付文林教授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① 《如何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振兴”》,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zhuanqu/bkqx/2019-08/13/c_1124870140.htm?ivk_sa=1024320u。

^② 《今年中央财政将安排衔接资金1561亿元 助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21-04/01/content_5597204.htm。

坚取得全面胜利后，衔接性和发展性是财政资金的两个重要特征。衔接性表明财政资金在特定时间（缓冲期）内为欠发达地区平稳实现自我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发展性表明财政资金立足长远，着眼可持续性，旨在构筑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最终目的都是构筑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这些倾斜性的财政资金具有阶段性，其支持力度会随着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那么，我国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变化对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存在什么影响？这种影响是否会因为自我发展能力不同而产生差异？回答这些问题为平稳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基础。已有研究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财政资金支持在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和低收入群体增收中的作用（Kim & Lambert, 2009；郭庆旺等，2016；张凯强，2018）。刘冬梅（2001）的研究表明财政资金在改善欠发达地区发展状况、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Meng（2013）研究发现多种财政资金支持使得农民收入在1994—2000年间增长了38%；张凯强（2018）研究发现获取更多的上级政府转移支付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经济稳定增长。但也有部分研究发现财政资金并未完全发挥其在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和低收入群体增收中的正向作用。还有部分研究发现更多的上级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并未显著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周敏慧和陶然，2016），且从地区教育的角度评估发现其对减少文盲既没有短期影响，也没有长期影响（Lü, 2015）；此外，王艺明和刘志红（2016）的研究表明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增加在短期内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长期影响不稳定或逐渐减弱。产生这一差异化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高效发挥财政资金在保障低收入群体增收中的积极作用以更好地瞄准低收入群体为条件（谢垚，2017），在大量财政资金倾斜的过程中产生了资金管理、资金瞄准、支出绩效等问题；第二，部分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自我发展能力不足，长期依赖财政资金的“输血”式支持导致其内生发展动力不足（范燕丽等，2021；李晗和陆迁，2022），易形成“等靠要”和“养懒汉”现象，对政策效果造成不确定性。

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研究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增加的积极作用，但从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的角度探讨其影响的研究较少。其中，佟大建和应瑞瑶（2019）认为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是脱贫县农民收入下降的重要原因，范燕丽等（2021）研究发现，在完善的退出机制和正向激励原则的保障下，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并不会引致脱贫县农民收入下降。这些研究以脱贫县的农村地区这一典型的低收入群体集聚地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对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的影响，但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且研究均集中于对地区平均效应的研究，并未从地区异质性的视角探讨产生差异化结论的原因。地区异质性普遍存在于各项政策实施过程中，即使同一政策施行于不同地区，其政策效应也会因多种因素而产生差异（张国建等，2019）。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基于2012年调出38个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一事件^①，构造2006—2019年县级面板数据，并从地区异质性的视角研究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情况的变化。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首先，区别于已有文献探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增加（如设立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产生的政策效应，本文基于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调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研究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脱贫县农民）收入增

^① 2012年调整与2016—2020年调整的差异在于，2012年调整允许调出省“出一补一”，该省的贫困县总数不变，而2016—2020年调整后贫困县退出历史舞台。此外，2012年调出的县不再享受国家专项扶贫资金的支持，即使部分县仍被纳入省定贫困县序列，整体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而2016—2020年调出的县具有政策缓冲期，享受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持。因此，本文采用2012年调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来研究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可以有效排除政策缓冲期内的财政资金支持带来的政策效应。

长情况变化,以探讨上级政府财政资金等优惠政策撤离后,低收入群体增收效应的可持续性。其次,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打开区域整体影响的“黑箱”,发现根据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不同,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情况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最后,本文探讨了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变化和整体财政支出变化,并进一步从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贷款的角度分析不同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差异,为后续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阶段财政政策的发力方向提供依据。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本文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包括数据说明、变量选择与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报告了基准实证结果、进行相关有效性检验及稳健性检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变化以及财政支出变化对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的影响;第五部分比较了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贷款的差异,从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差异的角度探讨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情况呈现地区异质性的原因;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财政资金是促进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中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力,而自我发展能力差异是造成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内在动力(郭熙保和周强,2016)。因此,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变化的原因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变化,二是自我发展能力差异。

我国县级财政对于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具有高度依赖性。1994—2019年我国县级政府平均财政自给率为45%^①,欠发达地区对于转移支付的依赖度更大,如甘肃省2021年县级财政平均自给率仅为25%。^②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使得欠发达地区整体财政支出减少。首先,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减少了地区的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减少是导致整体财政支出减少的直接原因。欠发达地区对转移支付依赖度较高,因此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对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影响较大。其次,欠发达地区为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依旧面临较大的财政支出需求,收支双重挤压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陡增,较高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迫使地方政府减少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规模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Miller & Russek, 1997),且在欠发达地区这种正向效应更明显(Ram, 1986),原因在于欠发达地区私人部门投资和公共间接投资(如国有企业投资等)匮乏。对我国农村地区而言,财政支出在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完善农业投资建设、吸引私人及公共间接投资中具有重要作用(林伯强,2005;杨义武和林万龙,2021),这些公共投资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低收入群体增收提供了内生发展动力,这也是我国提出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各类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要进一步向这些地区倾斜(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8)的重要理论依据。基于以上分析,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一方面直接导致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导致其财政支出压力上升,财政收入减少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上升使得地区财政支出减少。基于财政支出在低收入群体增收中的重要作用,财政支出减少为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增添了不确定性。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1 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加、财政收入减少,由此引致

^① 《当前财政面临的主要矛盾与问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简报, https://www.chineseafs.org/cknewsmgr/newsContent_queryOneNewsRecord?retVal=cnzkcgxw&zyflag=1&searchFlag=2&newsid=1210100014_40212452。

^② 《各省市财政自给率如何?》,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bond/2022-06-14/doc-imizirau8385899.shtml?finpagefr=p_115。

的财政支出减少阻碍了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

自我发展能力是保障稳定脱贫的关键（左停等，2021）。能力贫困理论认为判断个体是否贫穷的标准在于是否具备实现自己想要的基本物质生活和自由的可行能力（阿马蒂亚·森，2001）。能力贫困理论在地区层面表现为一个地区是否具备摆脱贫困并防止再次陷入贫困的自我发展能力。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引致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减缓，这种减缓作用随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不同而呈现两种不同状态，即遮掩效应和抑制效应。^①

一方面，部分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资金和各项优惠政策的支持下，通过长期建设与自我发展逐渐摆脱对财政资金的过度依赖，即使财政资金支持力度缓慢下降，这部分地区也不会因脱贫后返贫。凭借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如合理的产业结构、完善的基础设施等），这些地区的低收入群体能够保持增收态势，逐渐摆脱低收入困境。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仅使得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幅度减小，产生遮掩效应。

另一方面，部分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依旧薄弱，自身造血能力不足使其无法摆脱对于财政资金的依赖，财政资金支持依旧是保障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的重要条件。这部分地区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时，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受阻，面临较大的返贫风险。此时，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进一步抑制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即产生抑制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2 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具备较强自我发展能力的地区能够维持收入加速增长态势，而自我发展能力较弱的地区收入增长减缓。

综上，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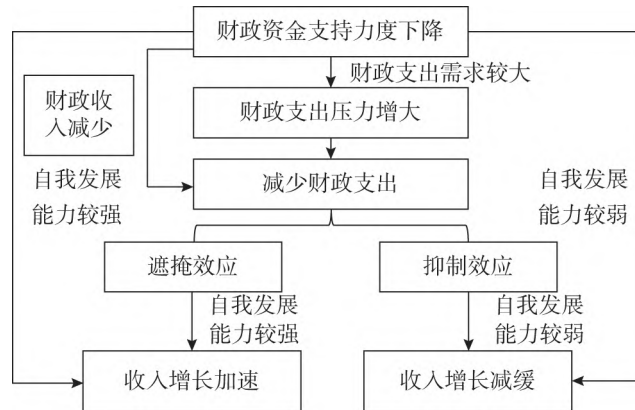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以2012年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名单调整这一事件为冲击，利用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长

^① 遮掩效应（Suppressing Effects）是指间接效应的方向与直接效应方向相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总效应可能因被“遮掩”而减小甚至不显著，在本文中指地区财政支出减少“遮掩”了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较强地区的收入增长幅度，但并未使其增长情况逆转。抑制效应（Restraining Effects）是指间接效应的方向与直接效应方向相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总效应加剧，在本文中指地区财政支出减少进一步“抑制”了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地区的收入增长。

情况变化考察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对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的影响,主要原因如下:其一,2012年调出名单后,各调出县不再享受国家专项扶贫资金支持,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其二,调出县相对于其他非贫县而言依旧是相对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中的农村地区是低收入群体的集聚地。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7—2020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查找各省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进行补充。2013年国家统计局实施了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开始使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代替原先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为保证数据口径的一致性,本文运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计算改革后的农民人均纯收入^①;从2018年起,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规则发生变化,年鉴中仅披露增长率,本文根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进行计算。合成控制法要求数据结构为无缺失值的平衡面板数据,经手动补充后仍存在少量数据缺失,本文运用插补法将其补齐。为最大限度地控制地理、环境、人文等不可观测因素对合成结果造成影响,本文采用同一省内的县进行相应县的合成^②,因此本文使用2012年存在调出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7个省^③的全部县级层面数据,剔除数据不可得的县后共515个县,其中34个县为脱贫县,182个县为未脱贫县(截至2020年均已全部脱贫),其余299个县为非贫县。数据中剔除了四川省、青海省的样本,首先在于四川省、青海省分别于2008年和2010年遭受地震冲击,对当地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投资状况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次在于两省内部县级数据缺失较多。本文采用同一省内的县进行相应县的合成,剔除这两个省的样本对本文的研究结果并无严重影响。

(二)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1. 预测变量(被解释变量)。本文预测变量为低收入群体收入的代理变量农民人均纯收入,采用各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换算为以2005年为基期的实际值并取其自然对数。由于观测期内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口径调整,本文运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计算口径调整后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即口径调整后本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本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2. 核心政策变量。本文的核心政策变量为2012年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调整的交互项($treat = poor \times time$),用于指代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变化,当时间 $t \geq 2012$ 时, $time = 1$;当时间 $t < 2012$ 时, $time = 0$ 。^④首先,设定全部脱贫县为实验组,全部非贫县为控制组,即若该县此次调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则 $poor1 = 1$;若为非贫县,则 $poor1 = 0$ 。根据合成控制分析结果,若实验组县的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合成县,则 $poor2 = 1$,若为非贫县,则 $poor2 = 0$,其余

^① 2013—2015年间国家统计局同时公布了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具体数值,根据计算可得:2014年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基本一致,均约为11.2%;2015年二者的增长率也基本一致,均约为8.9%。因此,本文假定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一致。

^② 本文中的县表示全部县级行政区划,包括县、区、自治县、旗等。

^③ 2012年共9个省存在调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序列的情况,包括河北省涉县、广平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东光县、献县、孟村回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旗、和林格尔县、清水河旗、固阳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克什克腾旗、准格尔旗、鄂托克前旗、杭锦旗、乌审旗、伊金霍洛旗、多伦旗;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安徽省长丰县、无为县、枞阳县、霍山县、泾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南丹县、天峨县;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陕西省彬县、安塞县、子长县、吴起县、府谷县、靖边县;四川省雅江县、新龙县;青海省尖扎县、玉树市。为方便阅读,后文对一些自治县、自治旗使用约定俗成的简称。例如,费城满族自治县简称宽城县。

^④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印发于2011年12月,因此本文设定2012年为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的起始年。

县剔除；若实验组县的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合成县，则 $poor3=1$ ，若为非贫县，则 $poor3=0$ ，其余县剔除。因此， $treat1$ 、 $treat2$ 、 $treat3$ 分别用于估计全部脱贫县、收入增长加速组、收入增长减缓组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其次，为进一步将脱贫县与未脱贫县进行比较，设定全部脱贫县为实验组，全部未脱贫县为对照组，即若该县此次调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则 $poor4=1$ ，若该县为未脱贫县，则 $poor4=0$ 。在此基础上，若实验组县的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合成县，则 $poor5=1$ ，若该县为未脱贫县，则 $poor5=0$ ，其余县剔除；若实验组县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合成县，则 $poor6=1$ ，若该县为未脱贫县，则 $poor6=0$ ，其余县剔除。因此， $treat4$ 、 $treat5$ 、 $treat6$ 分别用于比较不同组中脱贫县与未脱贫县自我发展能力的差异。

3. 其他变量。参考张楠等（2020）和佟大建等（2020）的研究并综合考虑县级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人口特征、地理条件等作为控制变量，包括财政支出、产业结构、工业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储蓄率、贷款率、人口密度、医疗设施条件、距地级市中心距离、距省会城市距离。具体来说，财政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GDP \times 100；产业结构为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并以另一种衡量方式，即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作为补充；工业规模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自然对数；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 \times 100；储蓄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GDP \times 100；贷款率=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 \times 100；人口密度=年末总人口/土地面积；医疗设施条件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的自然对数；距地级市中心距离、距省会城市距离分别为距地级市中心距离与距省会城市距离的自然对数。为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变化和整体财政支出变化，本文引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和人均财政支出指标，其中，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王佳杰等，2014；赵文哲和杨继东，2015；郗曼等，2021）^①，人均财政支出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年末总人口的天然对数。表1为本文所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研究方法

合成控制法最先由 Abadie & Gardeazabal（2003）率先提出并将其应用于单个目标决策单元的政策效应评估，目前已有许多国内外学者将其应用于各领域政策评估及政策效应异质性分析（Abadie *et al.*，2010；2015；刘友金和曾小明，2018；张楠等，2020）。合成控制法的主要优势在于：首先，该方法是一种非参的方法，通过数据驱动确定不同权重合成目标决策单元，避免了由主观选取对照组或选择单一对照组带来的误差；其次，该方法可用于考察单个目标决策单元的政策效应，而非传统政策评估方法估计的平均效应，可用于分析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性；最后，该方法可以清楚地反映每个对照组对合成虚拟目标决策单元的贡献。因此，该方法为本文研究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对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的异质性影响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给定 $K+1$ 个县在 $t \in [1, T]$ 期的农民人均纯收入。 Y_{it}^I 表示第 i ($i \in [1, K+1]$) 个县在特定时点 t 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调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时的农民人均纯收入； Y_{it}^N 表示第 i 个县在给定特定时点 t 未受到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影响时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假定第 i 个县在 T_0 ($T_0 \in [1, T]$) 时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其余 K 个县未受到影响，则在 $t \in [1, T_0]$ 时，任何县均不受影响，此时 $Y_{it}^I = Y_{it}^N$ ；当 $t \in [T_0+1, T]$ 时，受到影响的农民人均纯收入 Y_{it}^I 是真实可观测的，但假定该县未受影响的事实农民人均纯收入 Y_{it}^N 是无法观测的（同一个县只能有受到影响或未受影响一种状态）。因此，本文参考 Abadie *et al.*（2010）提出的方法估计 Y_{it}^N ，估计

^① 在不同研究背景下，该指标的定义存在一定差异，如赵文哲和杨继东（2015）将其定义为地方政府财政缺口压力，郗曼等（2021）将其定义为财政依赖。本文参考王佳杰等（2014）的研究将其定义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

模型如式 (1) 所示:

$$Y_{it}^N = \delta_i + \theta_i Z_i + \lambda_i \mu_i + \epsilon_{it} \quad (1)$$

式中, δ_i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Z_i 为可观测的 $r \times 1$ 维协变量, θ_i 为 $1 \times r$ 维未知参数向量, λ_i 为 $1 \times F$ 维无法观测的公共因子向量, μ_i 为 $F \times 1$ 维不可观测的地区固定效应, ϵ_{it} 表示对所有县均值为 0 的不可观测的随机扰动项。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Panel A: 全部县基本特征					
变量名称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农民人均纯收入 (<i>lnincome</i>)	8.641	0.528	6.813	11.480	6830
地区生产总值 (<i>gdp</i>)	112.378	118.782	1.457	1362.878	7169
人口密度 (<i>pop</i>)	2.891	2.796	0.002	20.539	7195
工业规模 (<i>indscale</i>)	3.638	1.013	0	6.138	7051
财政支出 (<i>expratio</i>)	22.166	14.126	0.532	137.298	7168
人均财政支出 (<i>expopop</i>)	8.333	0.875	5.103	11.336	7203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 (<i>press</i>)	4.962	4.933	-0.883	59.529	7203
产业结构 (<i>struc</i>)	1.096	1.115	0.029	19.698	7158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 (<i>first</i>)	22.970	12.125	0.140	73.502	7148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 (<i>second</i>)	42.835	16.568	1.361	116.658	7148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i>third</i>)	33.914	11.783	2.530	253.745	7141
固定资产投资 (<i>invest</i>)	82.809	42.850	1.098	489.882	6412
贷款率 (<i>loan</i>)	53.445	42.393	0.025	851.094	6774
储蓄率 (<i>save</i>)	72.167	39.894	0.016	734.474	6926
距地级市中心距离 (<i>lnins1</i>)	3.865	0.939	-1.873	5.730	7210
距省会城市距离 (<i>lnins2</i>)	4.800	0.628	1.676	5.820	7210
医疗设施条件 (<i>lnhospital</i>)	6.827	0.754	1.609	8.922	7071
Panel B: 脱贫县基本特征					
农民人均纯收入 (<i>lnincome</i>)	8.753	0.468	7.143	9.677	456
地区生产总值 (<i>gdp</i>)	163.695	172.294	13.739	1143.210	474
财政支出 (<i>expratio</i>)	16.541	8.121	3.548	49.013	474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 (<i>press</i>)	0.092	0.070	-0.239	0.338	474

说明: 为了更好地展示原始数据结构, 描述性统计结果由未经插补法补充的原始数据计算所得。

为求得 Y_{it}^N , 我们的目标是构造一个 $K \times 1$ 维权重向量 $W = (w_2, w_3, \dots, w_{K+1})$, $w_k \geq 0$, $k \in [2, K+1]$, $w_2 + w_3 + \dots + w_{K+1} = 1$ 。因此, 加权后控制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sum_{k=2}^{K+1} w_k Y_{kt} = \delta_i + \theta_i \sum_{k=2}^{K+1} w_k Z_k + \lambda_i \sum_{k=2}^{K+1} w_k \mu_k + \sum_{k=2}^{K+1} w_k \epsilon_{kt} \quad (2)$$

假定存在一个权重向量 $W^* = (w_2^*, w_3^*, \dots, w_{K+1}^*)$, 使得:

$$\sum_{k=2}^{K+1} \omega_k^* Y_{k1} = Y_{11}, \sum_{k=2}^{K+1} \omega_k^* Y_{k2} = Y_{12}, \dots, \sum_{k=2}^{K+1} \omega_k^* Y_{kT_0} = Y_{1T_0} \quad (3)$$

且满足 $\sum_{k=2}^{K+1} \omega_k^* Z_k = Z_1$, Abadie *et al.* (2010) 证明了若 $\sum_{t=1}^{T_0} \lambda'_t \lambda_t$ 为非奇异矩阵, 则:

$$Y_{1t}^N - \sum_{k=2}^{K+1} \omega_k^* Y_{kt} = \sum_{k=2}^{K+1} \omega_k^* \left[\sum_{s=1}^{T_0} \lambda_s \left(\sum_{n=1}^{T_0} \lambda'_n \lambda_n \right)^{-1} \lambda_n \right]^{-1} \lambda'_s (\epsilon_{ks} - \epsilon_{1s}) - \sum_{k=2}^{K+1} \omega_k^* (\epsilon_{ks} - \epsilon_{1s}) \quad (4)$$

若受到影响前的时间较长, 在一般情况下式 (4) 等号右侧的均值趋于 0, 即 $\hat{Y}_{1t}^N = \sum_{k=2}^{K+1} \omega_k^* Y_{kt}$ 。此时受到影响后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的估计值为:

$$\hat{\alpha}_{1t} = Y_{1t} - \sum_{k=2}^{K+1} \omega_k^* Y_{kt}, t \in [T_0 + 1, \dots, T] \quad (5)$$

至此, 求估计值 $\hat{\alpha}_{1t}$ 的关键在于确定权重向量 W^* 。Abadie *et al.* (2010) 认为可采用最小化 X_1 和 X_0W 之间的距离 $\|X_1 - X_0W\| = \sqrt{(X_1 - X_0W)'V(X_1 - X_0W)}$ 确定权重向量, 其中 X_1 是未受影响时地区的 $m \times 1$ 维特征向量; X_0 的第 k 列表示地区 k 未受影响时的特征向量。 V 是一个 $m \times m$ 的对称半正定矩阵。虽然对于任意 V 估计结果均是有效的, 但 V 的选择会影响估计的均方根误差 (MSPE), 因此, 我们在 MSPE 最小化下确定最优 V^* , 从而得到最优权重向量 W^* , 以此得到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的估计值 $\hat{\alpha}_{1t}$ 。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影响

本文以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长情况作为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情况的代理变量, 经过逐一评估发现全部脱贫县可分成四种情况: (1) 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大于合成县 (收入增长加速组); (2) 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小于合成县 (收入增长减缓组); (3) 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基本无差异 (收入增长基本不变组); (4) 合成效果欠佳。^①

1. 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大于合成县。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大于合成县的有涉县、长丰县、安塞县、吴起县、泾县、平果县、子长县、杜柏尔特县、彬县、多伦县、克什克腾旗 11 个县, 这些县收入增长加速。图 2 展示了收入增长加速组中各实际县与合成县农民收入增长变动情况, 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之前各实际县与合成县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基本重合, 说明相应合成县能较好地拟合实际县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 实际县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大于合成县, 具体增长差异情况如图 3 所示。具体来看, 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前实际县与合成县农民收入差距在 0 值上下波动, 说明实际县与合成县间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并无显著差异; 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实际县与合成县的农民收入差值大于 0, 且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初期, 收入差距增大而后趋于平坦。

2. 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小于合成县。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小于合成县的有广平县、东光县、献县、和林格尔县、固阳县、达茂旗、鄂托克前旗、杭锦旗、乌审旗、伊金霍洛旗、枞阳县、霍山县、南丹县、天峨县 14 个县, 这些县收入增长减缓。图 4 展示了收入

^① 若 2012 年前合成效果欠佳, 2012 年后出现的收入增长情况变化很可能来源于前期合成结果所产生的误差, 因此, 本文中不予考察前期合成效果欠佳的清水河县、府谷县、靖边县, 具体合成结果留存备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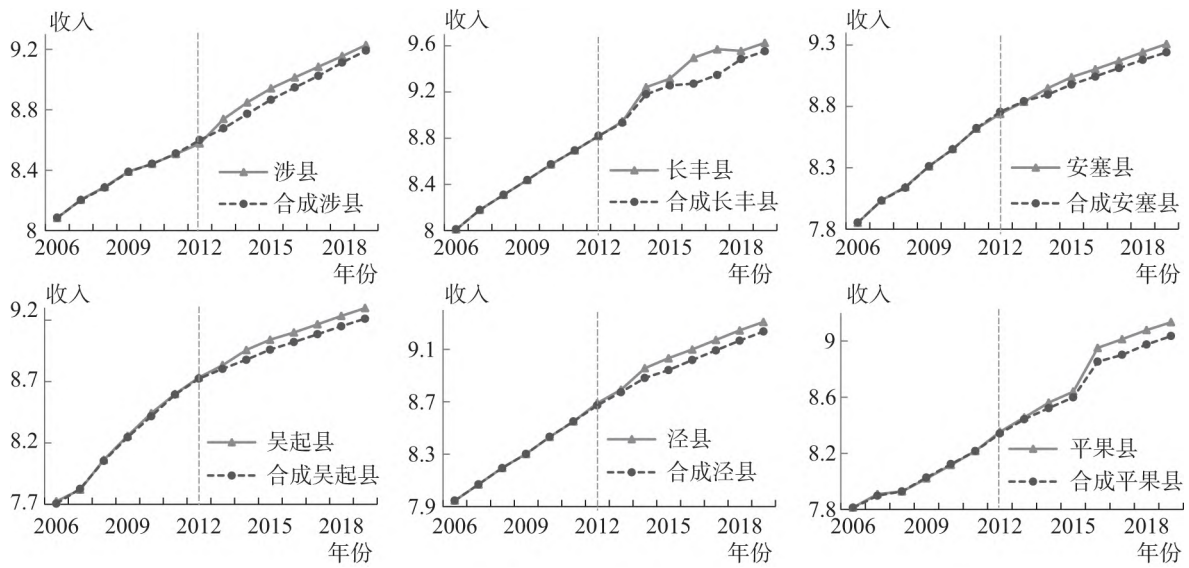


图2 收入增长加速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示例

说明：图中实线代表实际县农民收入增长情况，虚线代表相应合成县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垂直虚线代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的具体年份（2012年）。由于文章篇幅限制，本文仅展示其中6个县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剩余5个县的合成结果留存备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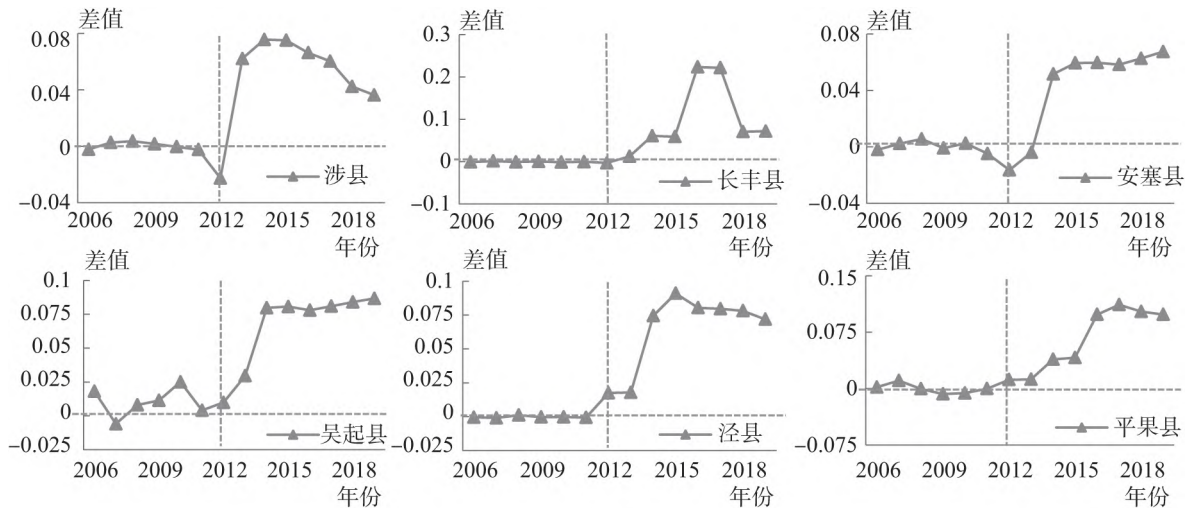


图3 收入增长加速组的农民收入差值情况

说明：由于文章篇幅限制，本文仅展示其中6个县的结果留存备案。

增长减缓组各实际县与合成县农民收入增长变动情况，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之前，实际县与合成县农民收入增长情况高度重合，说明合成县较好地拟合了实际县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之后，实际县的收入增长幅度小于合成县，表明该县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具体来看，图5直观地展示了实际县与合成县的农民收入差值，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之前，实际县与合成县的农民收入差值在0值上下波动，表明二者并未存在显著差异；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之后，实际县与对应合成县的农民收入差值小于0，并且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初期，其差值的降低幅度较大，之后趋于平稳，说明无论是收入增长加速组

还是减缓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初期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较大，而后逐渐趋于平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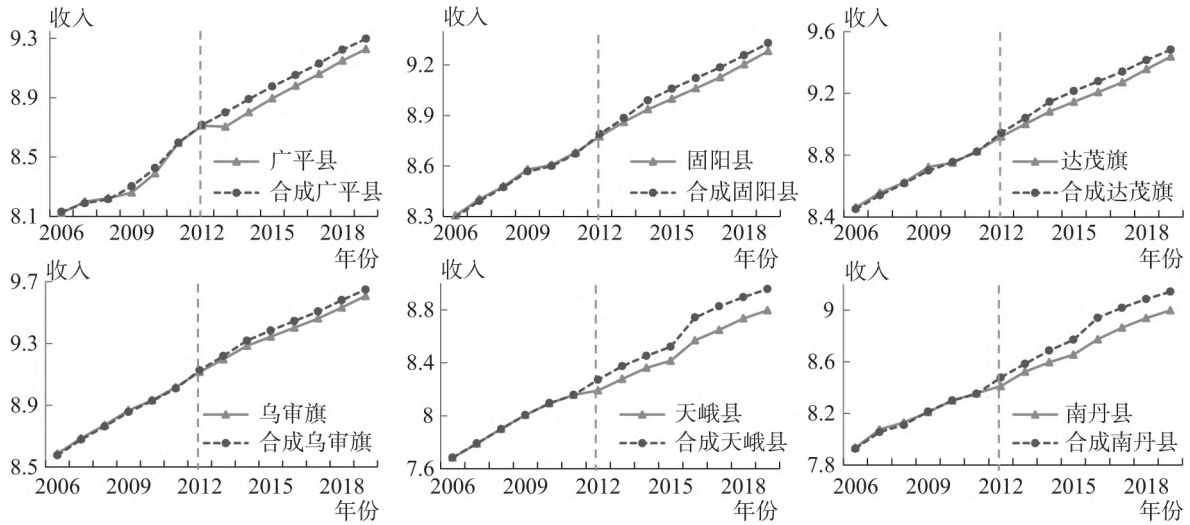


图4 收入增长减缓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示例

说明：横轴、纵轴、实线、虚线及垂直虚线的含义同图2。由于文章篇幅限制，本文仅展示其中6个县的结果留存备案，其余8个县的结果留存备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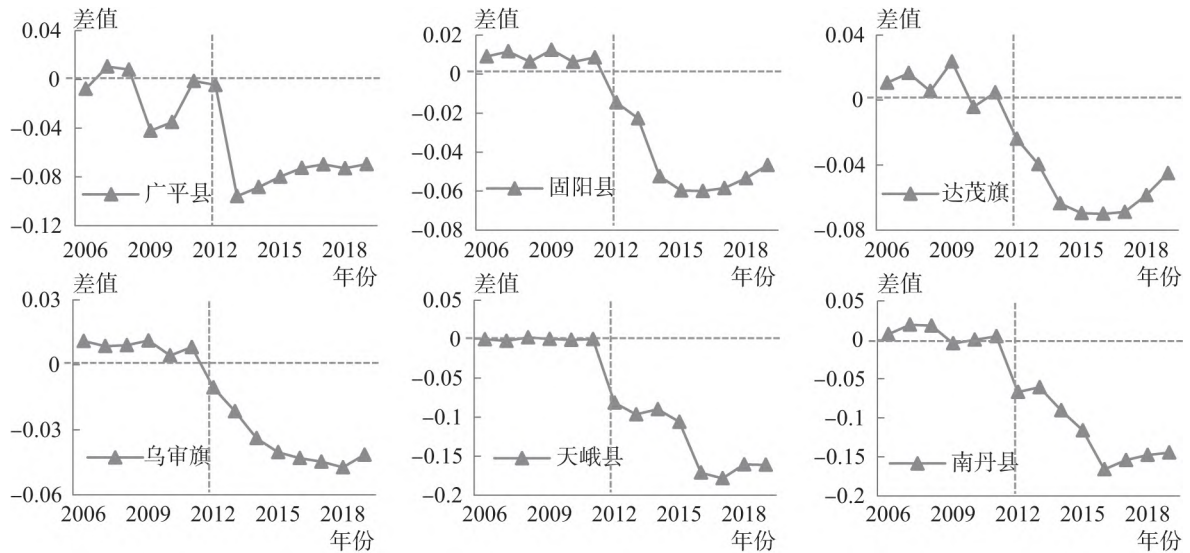


图5 收入增长减缓组的农民收入差值情况

说明：横轴、纵轴的含义同图3。由于文章篇幅限制，本文仅展示其中6个县的结果留存备案，其余8个县的结果留存备案。

3. 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前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基本无差异县。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基本无差异的有宽城县、孟村县、托克托县、准格尔旗、无为县、陵水县6个县，其农民收入增长情况与相应合成县的增长情况基本一致。图6中展示了其中3个县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前后的农民收入增长变化情况，其中(a)~(c)为各县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图，(d)~(f)为对应各县实际收入与合成收入的差值情况。由图可见，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前实际县与合成县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基本一致，表明合成县能够较好地拟合实际县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实际县与合成县的增长情况仍基本一致，说明该县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前后农民收入

增长情况并未发生显著变化。由实际县与合成县农民收入差值情况可见,该县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前后,实际县与合成县农民收入差值均在0值上下波动,更直观地说明实际县与合成县农民收入增长的差异很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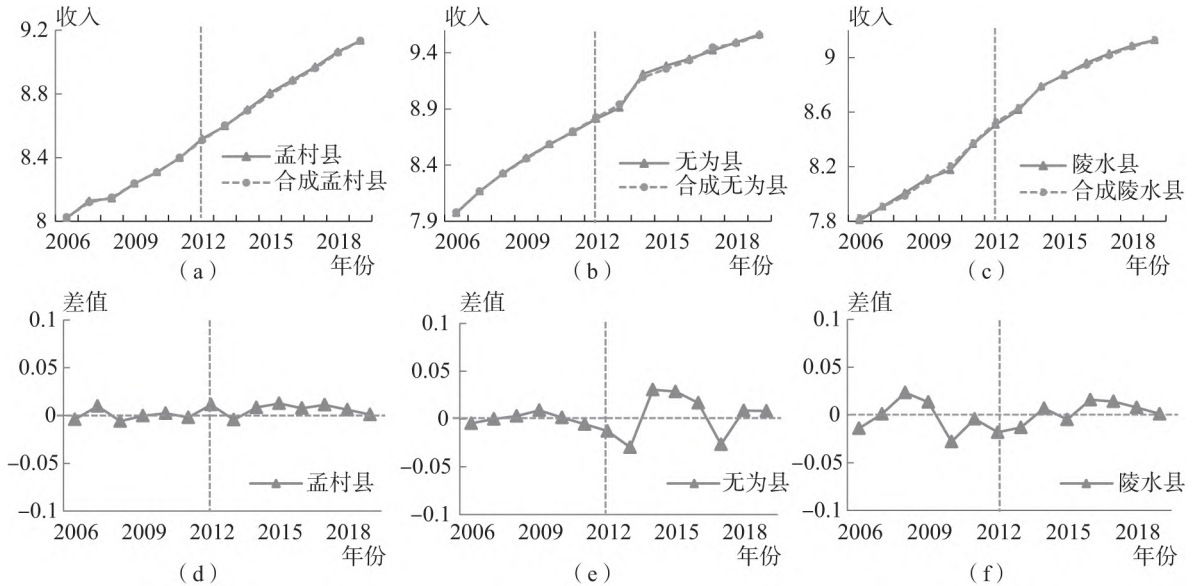


图6 收入增长基本无差异组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及农民收入差值示例

说明:(a)~(c)横轴、纵轴、实线、虚线及垂直虚线的含义同图2,(d)~(e)横轴、纵轴的含义同图3。由于文章篇幅限制,本文仅展示其中3个县的合成结果及相应差值情况,剩余3个县的结果留存备案。

(二) 有效性和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说明合成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对合成组县^①逐一进行排列序检验(Abadie *et al.*, 2010)。排列序检验的基本逻辑在于逐一合成每个控制组县,并计算每个控制组县的合成值与真实值的增长情况差值。若合成组县的差值分布于外侧,表明估计出更大效应的概率很小。本文剔除了控制组县中均方预测误差(RMSPE)大于2倍相应合成组县的样本(Abadie *et al.*, 2010),原因在于若调出前拟合的RMSPE较大说明拟合效果欠佳,即使之后出现较大的收入增长变化也可能来源于较大的拟合误差。对于RMSPE数值的选择,研究中并未有统一论,例如刘友金和曾小明(2018)排除了RMSPE高于1.5倍的城市;佟大建等(2020)排除了RMSPE高于2倍的城市,本文剔除2倍以上县是一个较为严格的标准。排列序检验结果显示合成组县差值均位于相应控制组县差值的外侧,这表明如果随机选择一个控制组县,要得到与合成组县一致的结果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说明合成组县与控制组县的合成差值存在显著差异。^②

合成控制法可以清楚地反映每个控制组县对合成虚拟目标决策单元的贡献。例如合成涉县由河北省乐亭县、迁安县、青龙县、隆化县、丰宁县、盐山县6个县分别以0.004、0.299、0.040、0.288、0.036、0.333的权重合成,其余县的权重为0。^③在该组合形式及权重下,2012年前合成涉县与实际涉县的特征高度相似,即认为合成涉县为实际涉县的反事实对照。

合成组的反事实对照由多个控制组县按照不同权重构成,其中部分县权重较大,这些县的权

① 合成组县指运用合成控制法构造的合成涉县、合成长丰县等31个虚拟目标决策单元。

②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展示排列序检验结果图,留存备案。

③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展示各县的合成情况,留存备案。

重较大说明其与合成县的相似度较高。为排除合成过程中相似度高的影响,本文将控制组县中权重最大的县剔除,重新合成新的反事实对照,新的合成结果与基准合成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控制组县差异并不会对合成结果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佐证了基准合成结果的稳健性。^①

合成控制法与双重差分法的核心思想类似,旨在找到一个控制组,通过对比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差异估计政策效应。因此,本文借鉴双重差分法中安慰剂检验的方法在控制组中随机抽取相应数量的县,并假定其在2012年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Li *et al.*, 2016),具体操作如下:在收入增长加速组的全部控制组县中随机选取11个县假定其于2012年受到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的影响并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将这一随机赋值过程重复500次;同理,在收入增长减缓组的全部控制组县中随机选取14个县假定其于2012年受到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的影响并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将这一随机赋值过程重复500次。结果显示,两个组的500次随机赋值估计结果均集中于0值附近,且两个组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分别为0.085和-0.079,与分布图均无交点^②,说明两个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农民收入增长情况的异质性并非由偶然或未观测到的因素引致。该结果再次佐证基准结果的有效性。

(三)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与财政支出变化

我国县级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率存在显著地区差异,发达地区的财政自给率相对较高,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自给率极低、对上级政府转移支付依赖度较高,如2020年献县各项转移性收入达26.1亿元,占预算总收入的61.5%。^③那么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是否会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不同地区是否存在差异?

表2的结果显示收入增长加速组与收入增长减缓组的财政支出压力均出现不同程度上升,究其原因在于调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后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直接减少了其财政收入,而我国县级地方政府对于上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度较高,在面对较大的财政支出需求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加。进一步分析不同组的差异,发现收入增长加速组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长显著,而收入增长减缓组虽同样面临财政支出压力上升的困境,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原因在于两个组财政收入端的差异,收入增长加速组人均财政收入显著下降,而收入增长减缓组人均财政收入下降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如表2列(1)和列(4)所示。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为预防规模性返贫,财政资金对于自我发展能力相对不足的县仍存在部分倾斜。此外,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的影响发现,无论是收入增长加速组还是收入增长减缓组,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均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该结论与郗曼等(2021)的研究结果一致。

财政支出从多个维度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林伯强,2005;佟大建和应瑞瑶,2019)。本文借鉴温忠麟等(2004)及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方法对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农民收入变化、财政支出变化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并对收入增长加速组与收入增长减缓组进行分组讨论,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列(1)、列(4)的结果表明从平均效应来看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相较于控制组县,一部分县农民收入增长,一部分县农民收入下降,该结果进一步佐证了基准合成的结论。财政支出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如列(3)、列(6)所示,而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使得地区整体财政支出受到约束,如列(2)、列(5)所示。从收入增长加速组来看,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使得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显著减少,财政支出减少并未颠覆农民收入增长态势,但产生了显著遮掩效应,也就是说收入

①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展示新的合成结果,留存备索。

② 由于篇幅限制,双重差分的模型、估计结果、平行趋势检验及安慰剂检验结果图不再展示,留存备索。

③ 数据来源:献县2020年财政决算情况报告。

增长加速组的县具备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相较于控制组县，在财政支出减少的情况下农民收入仍出现增长，但财政支出减少导致该组各县的农民收入增幅下降。与收入增长加速组类似，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使得收入增长减缓组各县的财政支出也出现显著下降，财政支出减少对农民收入增长产生显著抑制效应。

表 2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变化及其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变量	收入增长加速组			收入增长减缓组		
	(1)	(2)	(3)	(4)	(5)	(6)
	人均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压力	农民收入	人均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压力	农民收入
<i>treat2</i>	-0.370*** (0.133)	0.838** (0.327)	0.087*** (0.030)	—	—	—
<i>treat3</i>	—	—	—	-0.129 (0.104)	0.465 (0.353)	-0.077*** (0.022)
<i>stress</i>	—	—	-0.003** (0.002)	—	—	-0.003** (0.002)
<i>expratio</i>	0.014*** (0.003)	0.066*** (0.018)	0.002** (0.001)	0.013*** (0.003)	0.067*** (0.018)	0.002*** (0.001)
<i>invest</i>	0.002*** (0.000)	-0.007*** (0.002)	0.000 (0.000)	0.002*** (0.000)	-0.008*** (0.002)	0.000 (0.000)
<i>loan</i>	0.001 (0.001)	-0.002 (0.002)	-0.000 (0.000)	0.001 (0.001)	-0.002 (0.002)	-0.000 (0.000)
<i>save</i>	-0.002*** (0.001)	-0.006** (0.003)	-0.001*** (0.000)	-0.002*** (0.001)	-0.006** (0.003)	-0.001*** (0.000)
<i>pop</i>	-0.049 (0.039)	-0.265* (0.148)	-0.006 (0.007)	-0.048 (0.039)	-0.274* (0.151)	-0.006 (0.007)
<i>indscale</i>	0.108*** (0.037)	-0.418** (0.168)	0.024*** (0.009)	0.134*** (0.037)	-0.474*** (0.174)	0.025*** (0.010)
<i>first</i>	-0.014*** (0.004)	-0.017 (0.023)	0.003*** (0.001)	-0.014*** (0.004)	-0.016 (0.023)	0.002*** (0.001)
<i>second</i>	0.008*** (0.002)	-0.038*** (0.010)	0.003*** (0.001)	0.006*** (0.002)	-0.036*** (0.010)	0.003*** (0.001)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 192	4 192	3 999	4 241	4 241	4 054
R ²	0.864	0.115	0.946	0.865	0.121	0.946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县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五、进一步讨论和解释

1. 产业结构差异。产业结构优化能持续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二、三产业的发展能充分吸纳农村劳动力，为农民提供赖以生存的生计来源，促进农民增收（宁静等，2019）。如表 4 所示，收入增长加速组的区县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仍能保障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显著上升，说明这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动力来源已非完全依赖于财政资金支持，而收入增长减缓组的县产业结构优化并不显著。进一步分解不同产业的变化情况，无论是收入增长加速组还是减缓组第一产业占比和第三产业占比均保持稳定增长，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收入增长加速组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第二产业占比并未出现显著下降，而收入增长减缓组的第二产业占比显著下降，由此可见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对农村第二产业发展存在不利影响，进而对农民持续增收产生消极影响。与此同时列（2）、列（6）的结果显示第

一产业是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压舱石，第一产业在农村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仍须加强。

表 3 财政支出在不同组中的异质性作用

变量	收入增长加速组			收入增长减缓组		
	(1)	(2)	(3)	(4)	(5)	(6)
	农民收入	人均财政支出	农民收入	农民收入	人均财政支出	农民收入
<i>treat2</i>	0.077*** (0.029)	-0.294*** (0.069)	0.089*** (0.029)	—	—	—
<i>treat3</i>	—	—	—	-0.083*** (0.022)	-0.096*** (0.035)	-0.079*** (0.022)
<i>expop</i>	—	—	0.046** (0.021)	—	—	0.047** (0.0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 999	4 192	3 999	4 054	4 241	4 054
R^2	0.946	0.937	0.946	0.945	0.939	0.946

说明：为防止多重共线性影响，本表未控制财政支出 (*exratio*)。

表 4 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不同组的产业结构差异

变量	收入增长加速组				收入增长减缓组			
	(1)	(2)	(3)	(4)	(5)	(6)	(7)	(8)
	产业结构	一产占比	二产占比	三产占比	产业结构	一产占比	二产占比	三产占比
<i>treat5</i>	37.544** (14.951)	3.206*** (1.181)	-5.652 (3.521)	4.193* (2.250)	—	—	—	—
<i>treat6</i>	—	—	—	—	10.456 (9.428)	1.968* (1.075)	-3.853* (2.163)	3.455* (1.81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 895	1 898	1 898	1 895	1 945	1 947	1 947	1 945
R^2	0.260	0.456	0.324	0.447	0.263	0.450	0.325	0.437

说明：为研究产业结构差异，本表控制变量不包括产业结构 (*first*, *second*)。

2. 基础设施建设差异。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我国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扶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要政策举措（张亦然，202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地区基本建设力度。由表 5 列（1）～列（3）可见，从全样本来看，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固定资产投资显著下降，且收入增长减缓组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下降幅度更大，收入增长加速组的固定资产投资并未出现显著下降。此外，财政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支出是促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因此不同组的基本建设支出变化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财政资金对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以河北省为例，2006 年收入增长加速组中涉县的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为 16.16%，而收入增长减缓组的广平县、东光县、献县的基本建设支出分别仅为 7.13%、2.98%、4.44%^①，远低于涉县，说明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支出偏向在我国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完善工作中成效显著。

① 资料来源：由 2006 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计算所得。

表 5 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不同组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贷款差异

变量	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贷款		
	(1)	(2)	(3)	(4)	(5)	(6)
	全样本	收入增长加速组	收入增长减缓组	全样本	收入增长加速组	收入增长减缓组
<i>treat4</i>	-17.238** (7.819)	—	—	0.332 (2.495)	—	—
<i>treat5</i>	—	-12.844 (14.319)	—	—	0.204 (3.057)	—
<i>treat6</i>	—	—	-22.998* (11.904)	—	—	-2.038 (3.42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 174	1 898	1 947	2 174	1 898	1 947
<i>R</i> ²	0.285	0.328	0.310	0.478	0.489	0.478

说明：为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差异与金融贷款差异，本表列（1）～列（3）未控制固定资产投资（*invest*），列（4）～列（6）未控制贷款率（*loan*）。

3. 金融贷款差异。信贷门槛高是导致欠发达地区农民资金匮乏的重要原因。降低信贷价格、提高信贷的可及性、向农民提供有偿的以发展产业为依托的资金支持，能够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发展潜力的群体摆脱金融排斥，从而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吴本健等，2019）。如表 5 列（4）～列（6）所示，两个组金融贷款率的估计结果符号相反，但统计上均不显著，说明两个组金融贷款率均未出现显著提升或下降，地区层面金融贷款率差异对农民收入增长差异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欠发达地区农民存在金融权力排斥、金融能力低下、金融素养和技能偏低、普惠金融到户困难等问题（谭燕芝和彭千芮，2019；罗煜和曾恋云，2021）。此外，各县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包含工业贷款、农业贷款、商业贷款等各种形式的贷款余额，囿于数据的可行性，无法准确度量由于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而引致的农业金融贷款余额减少量，这也是地区层面金融贷款率并未呈现统计意义上显著差异的又一重要原因。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2006—2019 年县域面板数据研究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对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的影响。根据收入增长情况的地区差异，本文将 2012 年调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县分成收入增长加速组、收入增长减缓组及收入增长基本不变组；基于此，本文进一步从财政支出压力变化、财政支出变化、自我发展能力差异等方面探讨产生地区差异的原因。

本文的主要发现有：第一，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情况存在地区差异。在观测的 31 个县中，约 35.48%（11/31）的县农民收入增长加速，约 45.16%（14/31）的县增长减缓，约 19.35% 的县（6/31）基本无差异。第二，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原因在于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对于上级政府财政资金的依赖度较高且欠发达地区在平稳衔接乡村振兴过程中，地方政府依旧面临较大的支出需求。第三，财政收入减少和支出压力增大引致整体财政支出减少，进而对不同地区产生异质性影响。一方面，在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较强的地区，农民收入依旧呈加速增长趋势，但增长幅度下降，产生遮掩效应；另一方面，

在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薄弱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减缓，产生抑制效应。第四，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差异是导致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情况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为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提供原动力；基础设施建设在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中具有积极作用；由于金融权力排斥、金融能力低下等问题，金融贷款的积极效应尚未完全释放。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并结合现阶段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实现乡村振兴及共同富裕的目标，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和实施各项帮扶政策、保障政策和激励政策。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如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是低收入群体聚集地，这些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且原因多样，如自然环境恶劣、产业结构落后、技能水平低下、发展动力不足等，因此，需立足于当地发展的比较优势，针对性地实施多样性的帮扶政策、保障政策与激励政策，防止政策因“水土不服”而削弱政策效果。第二，降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对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过度依赖，从收入端出发缓解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充分利用激励与约束机制，如将上级政府财政资金支持与本级政府自有财力的增长挂钩，激励地方政府加强自身财源建设。第三，发挥财政资金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生产要素流入中的积极作用，如高技能劳动力、市场资本、高科技技术等，从根本上提升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自我发展能力。发挥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金融支持等措施的合力，推动财政资金支持与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直接挂钩，如利用财政资金助力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采取“以奖代补”等措施发挥财政资金正向激励作用，实施低收入群体技能培训获证奖补政策等。

参考文献

- [印度]阿马蒂亚·森，2001：《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范燕丽、丛树海、郝曼，2021：《从“争穷保帽”到“主动摘帽”：正向激励与农民持续增收》，《财政研究》第12期。
- 郭庆旺、陈志刚、温新新、吕冰洋，2016：《中国政府转移性支出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世界经济》第8期。
- 郭熙保、周强，2016：《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经济研究》第6期。
- 李晗、陆迁，2022：《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与家庭发展韧性——来自中国低保政策的经验证据》，《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 林伯强，2005：《中国的政府公共支出与减贫政策》，《经济研究》第1期。
- 刘冬梅，2001：《中国政府开发式扶贫资金投放效果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6期。
- 刘友金、曾小明，2018：《房产税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来自重庆和上海的经验证据》，《中国工业经济》第11期。
- 罗煜、曾恋云，2021：《数字金融能力与相对贫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2期。
- 宁静、殷浩栋、汪三贵、刘明月，2019：《产业扶贫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准实验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第4期。
- 谭燕芝、彭千芮，2019：《金融能力、金融决策与贫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2期。
- 佟大建、方小珍、张士云、应瑞瑶，2020：《扶贫改革试验区的减贫效应评估——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农业技术经济》第10期。
- 佟大建、应瑞瑶，2019：《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可持续性——基于贫困县名单调整的准自然试验》，《改革》第11期。
- 王佳杰、童锦治、李星，2014：《税收竞争、财政支出压力与地方非税收入增长》，《财贸经济》第5期。
- 王艺明、刘志红，2016：《大型公共支出项目的政策效果评估——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为例》，《财贸经济》第1期。
- 温忠麟、叶宝娟，2014：《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第5期。
-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2004：《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第5期。

吴本健、葛宇航、马九杰, 2019:《精准扶贫时期财政扶贫与金融扶贫的绩效比较——基于扶贫对象贫困程度差异和多维贫困的视角》,《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郝曼、付文林、范燕丽, 2021:《财政依赖与地区减贫增收——基于国家级贫困县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财政研究》第7期。

习近平, 2021:《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第20期。

谢堃, 2017:《公共转移支付对再分配及贫困的影响研究》,《经济研究》第9期。

杨穗, 2022:《低收入群体增收与福祉改善的保障路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第4期。

杨义武、林万龙, 2021:《农机具购置补贴、农机社会化服务与农民增收》,《农业技术经济》第9期。

张国建、佟孟华、李慧、陈飞, 2019:《扶贫改革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政策有效性评估》,《中国工业经济》第8期。

张凯强, 2018:《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稳定——基于国家级贫困县划分的断点分析》,《财贸经济》第1期。

张楠、张栋浩、李建军、卢洪友, 2020:《长期减贫的未雨绸缪——来自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证据》,《财贸经济》第3期。

张亦然, 2021:《基础设施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农村公路的考察》,《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2期。

赵文哲、杨继东, 2015:《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与土地出让方式——基于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互利行为的解释》,《管理世界》第4期。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敏慧、陶然, 2016:《市场还是政府:评估中国农村减贫政策》,《国际经济评论》第6期。

左停、李泽峰、林秋香, 2021:《相对贫困视角下的贫困户脱贫质量及其自我发展能力——基于六个国家级贫困县建档立卡数据的定量分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Abadie, A., A. Diamond, and J. Hainmueller, 2010,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for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California’s Tobacco Control Progra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05 (490): 493–505.

Abadie, A., A. Diamond, and J. Hainmueller, 2015,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 (2): 495–510.

Abadie, A., and J. Gardeazabal, 2003, “The Economic Costs of Conflict: A Case Study of the Basque Count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 (1): 113–132.

Kim, K., and P. J. Lambert, 2009, “Redistributive Effect of U. S. Taxes and Public Transfers, 1994–2004”, *Public Finance Review*, 37 (1): 3–26.

Li, P., Y. Lu, and J. Wang, 2016, “Does Flattening Government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3 (6): 18–37.

Lü, X., 2015,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and Local Education Provision—Evaluating China’s 8–7 National Plan for Poverty Reduc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33 (4): 200–211.

Meng, L., 2013, “Evaluating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01 (1): 1–11.

Miller, S. M., and F. S. Russek, 1997, “Fiscal Structur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Evidence”, *Economic Inquiry*, 35 (3): 603–613.

Ram, R., 1986, “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 A New Framework and Some Evidence from Cross-section and Time-series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1): 191–203.

(责任编辑:张雨潇)

Financial Support and Sustainable Income Growth of the Low-income Groups

FAN Yanli^{1,2} CONG Shuhai³

- (1.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 The Institute of Local Finance Research, Key Research Center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of Zhejiang Province;
3.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ummary: Promoting sustainable income growth of low-income groups is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mplete victory” in poverty alleviation shows that fiscal funds have played a huge role in ensuring income growth for low-income groups. However, the targeted fiscal funds, such as spe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temporary, and will change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regions. The income growth heterogeneity after the reduction in financial support provides new evide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w-income groups.

This study uses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to evaluate th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of rural income growth after the reduction of financial support based on county-level panel dataset from 2006 to 2019,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reason of thi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observed 31 coun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according to income growth of low-income groups, including the rising type (about 35.48%), the declining type (about 45.16%), and the invariant type (about 19.36%). Second, the reduction in financial support increases fiscal expenditure pressure of local governments. Underdeveloped areas rely heavily on financial support from higher-level governments, and local governments still have significant expenditure demands for linking up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rd, the decreased fiscal income and increased expenditure pressure lead to an overall reduction in fiscal expenditure, which has heterogeneous effects on different types of regions. On the one hand, it results in suppressing effects, where regions with relatively strong self-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still show an accelerating growth trend, albeit at a reduced rate. On the other hand, it leads to restraining effects, where regions with relatively weak self-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show slowed income growth. Fourth,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self-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Howev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inancial loans has not been fully released due to financial power exclusion, and low financial capacity, etc.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irst, we should tailor and implement support, guarantee, and incentive polic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Second,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incentive and constraint mechanisms to encourage local governments to strengthen their own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truction, such as linking financial support with the growth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own financial capacity. Third, we should leverage the positive role of fiscal funds in promoting the in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to underdeveloped areas, such as high-skilled labors, market capitals, high-tech technologies, etc., to fundamentally enhance the self-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of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low-income group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income growth of the low-income group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financial support;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